

遂昌文史資料

第三輯

浙江省遂昌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6年10月

遂昌文史资料

(第三辑)

目 录

一、回忆陆希澄先生.....	陈烈生(1)
二、我所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	许扬本(8)
三、李士群与汪伪政权.....	叶耀先(17)
四、我所知道的李士群.....	程一戎(31)
五、记钻营发财的傅雨亭.....	朱戈律(38)
六、陈蝶仙在遂昌.....	王馨一(40)
七、吴瑶二三事.....	包振鹏(44)
八、西宾兴公所.....	吴 勋(50)
九、遂昌简师的一场风波.....	范如明(53)
十、遂昌昆曲活动和“五月会”盛况记实.....	黄炳文(56)
十一、遂昌“十番”.....	华 俊(73)
十二、蔡源班的盛衰.....	吴焕光(83)
十三、济南桥、众善桥兴建记略.....	邝 和(87)
十四、解放前遂昌的山货业.....	范 镛(90)
十五、遂昌县“二五减租”概况.....	雷关贤(98)
十六、遂昌县教育史料拾零.....	叶 莘(103)

- 十七、孙传芳过兵遂昌传闻点滴…………… 李淑平(107)
- 十八、民国元年大水一瞥…………… 傅 贤(116)
- 十九、浙江省旧处属公路股券…………… 程 章(120)
- 二十、遂昌县少数民族代表赴京名单……… 钟马元辑(123)
-

回忆陆希澄先生

陈烈生

抗日战争初期，我认识陆希澄先生。自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共事将近两年。我对他总的印象是：为人刚直不阿。对抗日战争坚决，对阻碍抗战的顽固势力不妥协，敢于碰硬。对抗日革命青年倍加爱护，大胆信任，放手使用。这种领导人，实在难得。下面我就当年亲身同他接触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件事，回忆如下。

我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底到遂昌县去工作的。那时已有大批抗日青年在遂昌乡村从事组织发动农民的工作。经常在县里只有担任秘书的张锡昌、陈虞孙和担任民政科长的黄继武等同志。张锡昌同志当天把我介绍给县长陆希澄。那时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四十岁不到的样子，脸上很严肃，见了我也无多话。他说：“你有文化，编编乡建情报吧。”其实他是根据张锡昌秘书的建议安排的。因为有六七十个抗日青年在各乡，要有个综合情况的办公室，也叫乡建办公室。这个室主任由黄继武同志兼任。他忙不过来，叫我帮助搞搞。一天，接到乡建王村口办事处主任汪湘同志汇报，说王村口有个姓沈的顽固势力头头，（编者按，沈士荣是宣铁吾的人）他破坏我们抗日宣传，挑拨办事处与当地群众的关系，工作开展遇到困难。我把王村口的情况告诉张锡昌同志，和他一起

去找陆希澄。陆听了很恼火。他思考了一下就对我们说：“惩一儆百。就请陈烈生同志去王村口一趟。带二个警卫员，以特派员身分去处理这个家伙。王村口与县里电话联系困难，你去独立处理好了。”还问我：“敢不敢？”我说：“敢”。就遵照县长的命令出发了。我想王村口有汪湘等在那里，与他们商量着办吧。我到王村口同汪湘等商量后，召开群众大会，揭发了破坏抗战的坏人坏事，把那个姓沈的顽固势力头头拘留了几天。这一下他大失面子，在王村口吃不开了，以后就灰溜溜地走了。这件事说明陆希澄办事果断，对阻碍抗日的顽固势力处理坚决，敢于碰硬。同时也说明他对青年人的使用是大胆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遂昌社训总队副总队长（我记得副总队长姓李），是个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支持者。这个家伙很阴险。他为了反对陆希澄对社训总队的改革，煽动士兵闹事，反对陆希澄委派的洪宝珊同志当指导员，企图轰走洪宝珊。这个消息陆希澄知道后，就立即去社训总队召集全体士兵讲话，他严肃地说，“我是县长兼社训总队总队长，坚决主张抗日。现在我们国家生死存亡关头，派指导员是为了加强你们的思想教育，竟然有人反对，造谣欺骗你们，这是破坏抗日救国。谁敢这样做，站出来讲，不要背后捣鬼”。他这番义正辞严的话，使站在一旁的李副总队长头上一直冒汗。自此之后，洪宝珊同志受到士兵群众的爱戴。这个李副总队长也调走了，陆希澄仍兼总队长，加强了领导。这件事不但反映出陆希澄的政治气魄，而且也说明他敢于负责极度信任青年。

一九三八年九月，浙江顽固势力向浙南进步势力进攻，黄绍竑被迫让步。陆希澄县长只好辞职，改任有职无权的省府视

察员。他临走前找我们各区大部分青年开了一个联欢会，其实，那时大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陆希澄还强作欢颜，拿出他自己薪水请我们喝酒。我们青年中那位姓莫的歌唱家，临时编了一支改调的大刀进行曲，大家热烈欢唱起来。这一来大家情绪又高涨了。陆希澄更加兴奋，表示身离心不离，一定要和我们坚持到抗战胜利。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我们这些从遂昌撤退出来的同志，开始都聚集在丽水省建设厅，后来有部分同志调到丽水等县政工队去工作了，其余的二十多个同志，仍在丽水火柴厂库房里待上级分配工作。这时中共丽水特委通知我要执行一个临时任务，就是跟随陆希澄视察员到温台沿海各县去看看。这次视察是黄绍竑主席亲自率领的。第二天天刚微明，我们就分乘六辆轿车出发了。我不知道陆希澄坐在那辆车里。车子到青田县时天已大明，青田县府所有文武官员列队欢迎省主席兼省抗敌自卫部队总司令。吃过早餐，从青田乘船到温溪，陆希澄主动来与我乘一条船。他告诉我与主席同车船不好受，吹吹拍拍的人太多。我这只船小人少，谈话自由一点。他告诉我一个消息，省府出发时是六辆轿车，到海口休息时却多出一辆。这辆车你道是谁？原来是省里大名鼎鼎的教育厅长许绍棣。讲起许绍棣，我早从地下党同志那里听到过，他是国民党浙江CC派骨干，而且是陈立夫安在浙江的钉子。我从没见过他。陆希澄就暗指着那个穿棕黄色长袍的瘦小个子说，那就是许绍棣。他讯息很灵，主席出发是没告诉任何人的，他却知道了，并急急忙忙地追了上来，这下有好戏看了。开始我还不理解他的意图。黄绍竑从温州到平阳县当天下午，平阳县长徐用请黄绍竑在县府旁边大操场

上检阅组织起来的农民队伍。徐用首先讲话，他说，平阳地处沿海，敌人的兵舰常来游弋窥探，不能不防万一，所以要组织发动农民自卫，请主席对大家训话指示。平阳人民群众确实发动起来了，那天参加检阅的有二千多农民，他们步伐一致，队形整齐，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会场气氛异常热烈。会上，黄绍竑面对这样雄壮的农民队伍很兴奋，讲了个把钟头的话，并在会上表扬了平阳县长徐用。可是，第二天上午到了瑞安县，情况就完全两样。瑞安县县长吕律，肥头大耳，见了黄绍竑表面非常亲热，亦步亦趋，毕恭毕敬，这个人许是许绍棣的得意门生。许绍棣不绝赞美吕律治县精明，似乎比平阳县长徐用强得多。陆希澄听了很厌恶。他建议黄绍竑找瑞安县政工队队员开个座谈会。这天晚上吕律奉命找来了十五六个政工队员，其中半数女的，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黄绍竑外，有许绍棣、陆希澄和我。吕律很狡猾，他事先作了布置，大概要政工队报喜不报忧，省主席不问不要乱说。所以座谈会开始，除了一个政工队长讲了几句装门面的话外，其余政工队员都低头缄默不语。陆希澄看出苗头了，他望望黄绍竑，接着说，今晚是开座谈会，主席要听听你们大家的意见，这是个好机会，有话尽管说，主席会给你们撑腰的。这时黄绍竑虎着脸严肃地说，你们政工队是做动员群众抗战工作的，应该很活泼，很有勇气，敢于说话的，怎么这样胆怯？黄绍竑的话还未讲完，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政工队员嚎啕大哭起来，接着还有几个女队员也眼泪汪汪，这个座谈会开僵了。吕律、许绍棣知道弄巧成拙，露出一副狼狈相。陆希澄建议黄绍竑座谈会暂停，留下这个哭的女政工队员作个别谈话，了解情况。他们和那个女政工

队员谈话我没有参加，事后陆希澄告诉我，吕律搞法西斯专政，限制政工队自由活动，不许她们接近群众，如不服从，他就动辄乱加罪名，恶言训斥，或以开除相威胁。政工队员有苦难言。

陆希澄不象国民党政府中一般官员，对上吹吹拍拍，唯唯诺诺，他与主席一起时，要末沉默，要末提出自己见解；对送往迎来的繁文缛节也不感兴趣，所以当黄绍竑到达温州（永嘉县），第八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许宗武请黄绍竑去做报告时，他没有跟去参加，同我一起到温州街上去转了一下。陆希澄征得黄绍竑同意，他和我先到乐清县去看看，随后到台州各县去视察。他每到一县时，不光听县长汇报，还专门找政工队员了解情况，他不要我陪他到县衙门去，叫我单独到学校和群众团体去看看，向群众了解情况，这样使我有机会看看听听青年群众抗日活动情况和他们对县政所作所为的反应，然后向他汇报。

到临海县时（旧称台州府），他对乐清、温岭、黄岩、临海各县抗日救亡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一派太平麻痹思想，不发动组织群众，这些当官的只知道发国难财，如果日寇真来进攻，非一败涂地不可。他到临海的第二天告诉我，他不想到仙居县去了。要我代去看一下，反正那个山区抗战准备工作一定更差劲了。我说：“视察员，我怎么能代替你！我以什么名义去见仙居县太爷呢？”他说：“你就大胆去好了，我会给你安排好的。如果出什么问题，我来负责。”过了一、二个小时，他找来一个青年，据介绍是仙居县政工队员。他是在台州集中学习的，可以陪我去仙居。这个青年也不分青红皂白，就一口喊我视察员。我说不是，视察员

姓陆，我姓陈。他却说我知道，你太谦虚。就这样他把我引到仙居县。仙居县太爷姓胡，是老胡涂，老官僚，他也不问三七二十一，把我从县府大门迎到客厅，一声声喊视察员，我越说明，他却说，从前巡按大人视察州县，都这样隐姓埋名。我已经知道呢，你不用改姓了。真弄得我啼笑皆非，这恐怕也是陆希澄始料所不及的。不过这也又一次地说明陆希澄对青年人十分信任，放手使用，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九年，陆希澄调浙西行署任政务科长，政务处长是金华县长王力航。王未到任前，他这个政务科长还有点权，讲话还有人听。王力航一到任，他就成了挂名政务科长，他感到很不满意，认为黄绍竑错误估计形势，错误估计人。事实上行署是各派势力斗争激烈，各有后台：军务处是宣铁吾派的人；民运处是CC派的人；财务处是当时财政厅长黄祖培的人；视察室则是大杂烩，各派势力都有，明争暗斗，各不相让。陆希澄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有时他只能找我们去谈谈。当时我们十二人被定为少尉服务员，谁都可指使，不直属陆希澄领导。他对我们说，行署他呆不下去了，宁可去当老百姓，也不愿意在勾心斗角的旋涡里。我们说，你为什么不问省主席黄绍竑反映呢？他说没用了，黄绍竑在浙江耽多久也难料啊！可见他对浙江各派势力斗争前景是有远见卓识和深邃的洞察力的。以后，我们被编在省政工队，分赴敌后发动群众，同他见面就很少了。不久听说他真的离开了浙西行署。临走时，还找了原在遂昌工作的盛震叔同志谈了一次，要他转告我们“后会有期”。从此，我就没有见到过他。不过，我与他近二年的相处，深深感到，他这

种刚直不阿，坚决团结抗战，信任青年，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气魄是很值得怀念和学习的。

（作者简介：陈烈生同志一名平之，原任浙江省轻工业厅建设处处长，现已离休，1938年他曾在我县湖山区任区长）



一、来稿时限和范围：自戊戌变法后至“文革”前我县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侨务、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文史资料。

二、来稿文字务求翔实、确切，忠于史实，秉笔直书，以亲阅、亲见、亲历的材料为主。篇幅不限，体裁不拘。

三、对某些史料的侧面或点滴见闻，只要有借鉴价值的均可据实撰写，如有实物照片，欢迎附寄。

四、本刊对来稿可以选录或删改，不同意的可在稿末注明。来稿一经刊用，按史料价值即寄稿酬。

五、来稿请用16开有格稿纸誊写，字迹要求端正，并尽量使用规范的简化字书写，以便排印。

我所经历的一次重大事件

许扬本

(一)

1949年春，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风暴席卷全国之际，遂昌曾发生过一次在共产党地下组织影响下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有责任将事件真相，特别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如实地写出来，留给后人。古人云：“世治则修史”。当今欣逢盛世，应该是编集文史的时候了。

(二)

1947年我毕业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接着又应全国县长考试以第二名入选；随即分发浙江以县长任用，先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任视察。主席沈鸿烈组织了九个县政视导团，分赴各专区视察县政。我被分在第七视导团。团长为建设厅长皮作琼，副团长为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屠××（忘其名），我是团员兼秘书。视导团每到一县，在听取汇报检查工作后，皮作琼都要写一封亲启信给沈鸿烈，汇报这个县的政

治、经济、社会治安情况。这些信都由我执笔，皮作琼很赏识。我这个团是视察丽水专区的；因此，也到过遂昌，对遂昌政情有所了解。

视察尚未结束，突然传来了浙江省政府改组的消息，由陈仪（字公洽）继任省主席，各厅处长大多易人；因此，全团匆匆赶返杭州。

到杭州的第二天，报载邵力子抵杭，我就去谒见了。邵力子和陈仪都是绍兴人，私交很好。我原籍山阴县（属绍兴）。曾祖许世澍曾任清末两江总督的总文案（秘书长），为当时名幕；著有《秋水轩尺牍》一书，为学幕者所必读。这些，陈、邵都是知道的。我又担任过邵力子的私人秘书，因此邵力子就把我推荐给陈仪。

陈仪当即接见了，第二天又命我随他出席省参议会，担任记录。在这次会议上，遂昌县的省参议员叶萼联合许多议员提出要求撤换遂昌县长孙永年的议案；并在会上发言列举孙永年的劣迹，猛烈抨击。陈仪很注意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并看了我的记录稿，认为简练扼要，辞意确当；就叫民政厅长杜伟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出任遂昌县长。我同意后，即在省府委员会上通过，并在报上发表。

我本是一介书生，没有什么班底。当时的县长需要一套由“自己人”组成的班子。我在杭州由各方介绍凑成了一副班子，较重要的有方祥烈、李超斌、陈功铨等人。

（三）

我于1948年初夏到遂昌接印视事。当时面临的最大困

难是遂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县参议会议长刘凯和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童任侠为首的一派与以国大代表、省参议员叶萼为首的一派为了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各不相让，使县长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按实力而论，刘凯派在县内处于优势；但我在杭州省参议会上亲眼目睹前任孙永年由于叶萼的猛烈攻击而倒台，因此对叶萼不能不心存顾忌。当时两派在三个问题上的斗争，达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一个是县中校长问题。叶萼列举了原校长（刘凯派）的许多劣迹，要求撤换，并推荐程昌晋（中正大学毕业）继任，而刘凯坚不同意，经再三协商无效。我只得自兼校长，以程昌晋为校务主任，负实际领导责任，并另起用苏 纘（刘凯派）为总务主任，力求双方摆平。但实际上叶占上风，刘凯是不满意的。一个是国民党遂昌县党部的吃缺问题。当时县党部编制小，经费少，而实际人员超过编制定额。在孙永年当政时，这些超编人员就在县政府内吃缺，以资弥补。叶萼对此早有意见，经常作为话柄。我得知后下令不准吃缺。童任侠表面若无其事，暗中当然是悲恨的。一个是扣押县参议会秘书吴茂的问题。叶萼在杭州向省政府检举吴茂侵吞积谷，省府来文叫我扣押吴茂，送交司法审理。我执行了。这件事使刘凯极为恼怒，因为吴茂是他的亲信，又是县参议会秘书。扣押吴茂，大扫他的面子。因此刘、童等人曾几次密议，要推人到杭州向省政府告我的状。

但是，由于陈仪在位，有邵力子作后台，我本身又无不是，他们几经研讨，无隙可乘，只得一面等待时机，一面加紧拉拢我下面的人。如新任自卫副总队长薛俊卿、县警察局长刘敬陶、原保警中队长吴中 等人，被拉过去。甚至连我右左的警卫员，因为是遂昌本地人，也受他们的蛊惑而被拉

了过去。至于刘、吴等人的被拉，也有原因的。警察局长刘敬陶原是一个特务。前局长李腾芳因贪污吃缺，被我查觉后上报省保安处。保安处不得不将他撤职，但另派一名更老练的特务刘敬陶接任。他暗中监视我，曾几次密报保安处说我不可靠。吴中，原任县保警中队长，因在乡间纵兵殃民，被乡民向我告发，查有实据，我下令撤换，把他调到自卫总队部任参谋，他因而对我不满。

(四)

在县内的处境是如此困难，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军事溃败，政治腐朽，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我身历其境，不知如何是好？淮海战役末期，我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想另谋出路。不久，邵力子被派担任国共和谈代表，于是我单独一人秘密赴南京去见他。邵住在南京力学小学私邸内（力学小学是邵和夫人傅学文合办的，故名力学，语意双关），他略谈了目前形势，并告诉我几天后将飞往北京。从他的语意与态度中，我加深了原先的认识，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无法再打下去了。

刘凯们等待的时机终于来到了！省主席陈仪力求浙江和平解放。派人与中共秘密联系，并写信策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起义（汤浙江武义人。早先陈任浙军师长时，汤在陈部下任军职。解放战争中，孟良崮一役张灵甫师被歼，蒋介石怒斥汤恩伯指挥失当，给予处分。汤黯然卸职后闲居于西湖边。全仗陈仪向蒋力保，出任衢州绥靖公

署主任。旋又被蒋重用，改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料汤恩伯忘恩负义，竟向蒋告密。蒋很恼火。先派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周岩率兵到杭，任杭州警备司令；旋即改组浙江省政府，任命周为省主席。并派特务头子毛森在上海逮捕了陈仪。

形势逼人。遂昌的邻县松阳国民党县长祝更生转变立场，接受地下党的策动，已于三月十三日率部起义。我和祝更生本来相识，因此益感徬徨，必须作出抉择。但祝起义后受到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处境十分不利。

大约在1949年三月下旬的某一天，衢州绥署警卫营开到遂昌城郊外驻防（当时国民党后方兵力空虚，这个营经常在绥署附近几个县流动驻防，作为威慑力量，目的在于镇定人心）。遂昌各机关团体联名定于下午四时在县府大厅设宴欢迎该营官佐。三时左右，我到大厅看了一下情况，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突然看到一个穿着布长衫，坐在我的座位上翻看文件的陌生年青人。他见了我，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自我介绍说：“我叫吴鑫虎，是你的政大同学”。当时正值南京国民党政府疏散，到遂昌投靠我的政大同学不乏其人（如薛城材、赵抗强等），我以为他也是找我来的。不料他却说他是从祝县长那边来的，有祝的一封信带给我。说是信，其实只是一个小纸卷，我打开一看，字写得密密的，先叙友情，接着分析形势，指出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并以他自己为例，劝我当机立断，投向进步，接受地下党命令，发动起义。如果我同意起义的话，地下党即任命我为该地区副专员兼遂昌县长。最后说，吴鑫虎是地下党代表，他讲的话完全可信。

我乍听之下，十分惊愕，心想共产党对我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他竟能趁我不在的间隙，进入我的办公室，如果要杀害我，岂不易如反掌？当时由于赴宴的宾客已陆续来到，我恐怕暴露，就请吴鑫虎到县长室右边的一间房内去住，约他晚上再谈。吴也知道要宴请警卫营的事，连说好的。我招呼警卫员给吴端水送茶和菜饭，并锁上县长办公室的门后，就匆匆赶往大厅主持宴会。

宴会结束后，我到吴鑫虎住室作长谈。我们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国民党败局已定。但我又担心在国民党行将垮台的前夕起义，日后是否会被认为是投机？吴对此作了耐心的解释。说从全局看国民党大势已去，但从那时遂昌松阳的局部看，反动派力量暂时还大于革命力量。因此如果我发动起义，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还说共产党有坚定不移的政策，领导说话是算数的。于是我表示接受地下党的命令，同意发动起义。接着谈起义的时间问题，吴要求尽快一些，以分散敌人对祝更生部的压力。我说衢州绥署警卫营近在城郊，我只有三个自卫中队，内部尚不一致，如果马上发动，立即会被消灭，应等到警卫营走后再发动。吴鑫虎也表示同意。最后他说回去汇报请示后当再来遂昌联系，并作具体布置。

第二天一早，吴鑫虎就走了。不料中午前，自卫第一中队长陈功铨突然来向我报告，说军警联合巡逻队（由陈部抽调人员会同警局刑警组成，由陈功铨负责）在城外抓到一个可疑分子吴鑫虎，从他身上搜出一个本子，记载一些资料，可能是共产党云云。我听到后大吃一惊，叫陈功铨在外面暂候，沉思片刻，觉得只有立即放吴鑫虎回去，以免暴露，但

又必须有妥人护送出城，以免再出岔子。就命人把另一亲信主任秘书方祥烈叫来，简单地告诉他祝更生那边有一个人来，被巡逻队抓到了，并试探性地问他这事应如何办？方祥烈说还是早放为好。我很高兴他这样说，就说还得你送他出城免生意外，方也答应了。于是把陈功铨叫进来，我当面命令他亲自去把吴鑫虎放了，把人交给方秘书。方、陈就去执行了。

当天下午，方祥烈来向我报告，说吴鑫虎已安全回去，我方略觉心安。

我知道这件事迟早是包不住的。于是，立刻着手作起义的准备工作。先派人送我的妻子和一子（一岁）一女（三岁）回杭州。接着又派临安同乡陈××（忘其名）任新编自卫第三中队中队长。由于该队是保警队改编的，吴中的影响仍在，不能完全控制。

当时遂昌自卫总队下辖三个中队，我认为第一中队（陈功铨中队）比较可靠，就把它调进县政府内，据守县府大院；第二中队（中队长姓赵）已被薛俊卿所控制，由薛率领驻在一所庙宇内；第三中队则驻在县府附近。双方剑拔弩张，事实上已形成武装对峙。这时，吴鑫虎的事已被刘凯、童任侠所知。他们支持薛卿俊、刘敬陶，大造舆论，蛊惑人心，说我“通匪”，要“叛变”。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多人特别是有资产者及县府工作人员，都顾惜身家性命，明哲保身，对我敬而远之。

刘、童、薛见形势对自己有利，就软硬兼施，派人对我说，只要我自动离开遂昌，遂昌各界可以送五百石米（每石按市价折合银元5元，共2500块银元），给我作盘费，